

“生”与“死”是人的生命中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王船山认为，“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即人活着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是在于活得有意义。近日，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肖剑平做客国学讲座，阐述王船山的“生死观”——

“珍生务义”是生命存在的价值

■本报记者 许珂



肖剑平

生是生命现象存在的一种普遍形式，当然也包括人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体。王船山在反对佛家崇尚虚静以及宋儒贵心贱形的观点时，提出“安生”与“珍生”的重要观点，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但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弘扬人道精神，突出人的价值。

“日新之谓盛德”才能安“生”

王船山非常推崇张载，一生自诩“希张横渠之正学”，认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其中，他尤为推崇张子“民胞物与”“存顺没宁”的人生态度和生死情怀。

众所周知，横渠学的基本点在于天地万物皆为一气所化生，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既然气无有无之分，则人无所谓生死之别。人之生死，乃气之聚散，人死亦并非归于无，而是归于本源之“有”，是生不足喜、死不足忧。

“人有生死，这是自然的法则，永恒的趋势，不可阻挡，也不会停留。君子对待生死的态度应该是顺应它，安于生、安于死。”王船山在以气的屈伸来解释张载的生死论时说，万物包括人在内，有盛有衰、有生有死、有聚有散，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而这些运动变化的根源在于太和实体所内涵的动机。一个人如果不知生也不知死，那么无论他是为善还是为恶，皆非出自其自学与理性。而

且，最终还会坠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或者成为“无忌惮”一类，这都不是人间正道。

肖剑平告诉大家，虽然王船山的生死观源于张载，但又不囿于张载。王船山在注解张子《正蒙·太和篇》中就充分表达了其对生死的终极关怀。王船山认为，张子之“绝学”的核心就是“贞生死以尽人道”，人们从生死之理来达到尽人事之责，由“死”定“生”，由“死”正“生”。

王船山看来，《正蒙·太和篇》的宗旨就是“存神尽性，全而归之”，只有“存神尽性”的工夫才能“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意思是说，人在生时，如果为人处事有原则、有道德，能够尽性行道，则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因其活动“不扰”太虚之本体，不丧健顺之良能，其生命活动没有丧失从天地健顺之性得到的本性；而其死也异于禽兽之处在于他能“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这样就安生安死而尽人道，到达张载所谓的“存顺没宁”的境界。

“王船山倡导的是‘日新之谓盛德’。意思是在人之死、物之毁后是全新生命与物的诞生。他呼吁人们，从阴霾、颓废的泥潭中走出来，号召人们振作精神、奋发有为、修德进业。这就是王船山生死观与佛学生死观的根本区别所在。”肖剑平解释道。

每个人都应珍重自己的生命价值

其实，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虽然肉体的生命只有一次，但精神的生命却可万古长青。

在孔孟看来，生固然重要，但有比生更为值得珍爱的东西，这便是“行仁由义”。所以，自从孔孟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主张后，许多人在面对生还是死的选择中，都以此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可以说，王船山的生死价值观远承孔孟、近取张载，他提出“珍生”“务义”的生死价值观。意思是说，人要生存，首先不能离开自己生理、形体的存在。“珍生”就必须“贵生”，就必须重视个体生命的存在，用今天的话来说人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权，爱人、讲人道最现实的就是“珍生”“贵生”。

所以，王船山曾说过：“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意思是人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应该珍重人的生命价值；人之珍生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在王船山看来，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价值，它表现为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方面。人的自我价值不仅仅是自我的物质需求，它也突出地表现为自我志向的确立和人格的完善。

“人之为人，生与义是不可分离的，人通过‘载义’而表现出生命的本质与崇高，贵生也可以为义而舍身，这是儒学生死的突出特点。”肖剑平告诉大家，王船山把个人自我价值与其社会价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社会价值的突出表现是个人的社会责任，即义。

同时，王船山也对当时两种人的病态生活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他表示，一种人在“求食、求配偶、求安居”中度过，这种人不思进取，没有一点社会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终日油盐柴米、妻子儿女，这样的人虽醒却如在梦中，眼虽明却如盲人，四肢虽发达却心灵被蒙蔽；另一种人则表现为“富而骄，贫而谄，且而秦，暮而楚，缁衣而出，素衣而入，绳飞蝶惊，如飘风之终日，暴雨不终晨。”这是一种

无人格、人们嗤之以鼻的人生，只图荣华富贵，不颐气节操守。

“王船山生死观”有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贞生死以尽人道”，是王船山生死观的最终落脚点。其意思是，从体验生死之理来达到尽人事的责任，由“死”来决定“生”，使我们生活得更意义与价值，死的时候就无怨无悔。

在王船山看来，作为生命存在的人的价值，是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体，而人的价值大小主要通过其社会价值表现出来，这与当前社会所提倡的主流价值观是相吻合的。

“世教衰，民不兴行，见不贤而内自省，知耻之功大矣”；“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王船山认为，个人人格不但包括其自我人格的修养，而且也包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刻洞察与反思，表现出应有的道义与良知，从而树立起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崇高的人生理想。同时，那种崇尚志节和人格修养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是实现人的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王船山倡导的生死价值，既不是如道家所追求的从精神上齐生死以达到人生的自由，也不是如佛家那样由进人不生不灭之境来实现对生死的超然，而是取仁由义、投身实践，自觉地献身以立德、立功、立言达到人生之永恒。”肖剑平举例道，有一种人，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勇于献身，也就是林则徐所说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精神，理所当然地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体现，也应是每个国民应该践履的人生价值模式。

时至今日，王船山生死观中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我们今天克服困难、勇敢地面地面对人生和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激发进取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掘王船山生死观中的人生哲学精华，遵照客观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做到珍生乐死、生时不虚度时光、死而无愧无愧。



用典释义

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

【讲话原文】

1942年到1943年，胡志明主席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写下了“登山登到高峰后，万里奥图顾盼间”的诗句。中国唐代诗人王勃也说过：“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中越关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登高望远、携手努力，为开创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亚洲和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在越南国会的演讲》

【出处】

然天下之理，不可穷也；天下之性，不可尽也。有穷尽之地者，其唯圣心乎？有穷尽之路者，其唯圣言乎？故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会归可见也；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

——(唐)王勃《八卦大演论》

【解读】

《八卦大演论》是初唐诗人王勃的一篇易学文章。在王勃的家学渊源中，易学传承有自，其祖父文中子王通即为一代易学大家。王勃的易学思想属于北方易学的阴阳象数一派，带有以卦爻变化推知人生穷通

的特点。

在《八卦大演论》中，王勃指出天下之理不可穷，天下之性不可尽，只有圣人之心、圣人之言方可穷尽。接着用两组比喻说明“圣心”“圣言”的高屋建筑：“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会归可见也；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意谓站在大海之畔看众流归海，就可以尽览海纳百川的壮观景象；登临泰山看群峰朝揖，就可以明了山巅和山麓的主从关系。

王勃的上述比喻可能是受到孟子的启发。《孟子·尽心上》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的意思是说，孔子登上了东山(指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了泰山，就觉得天下变小了。所以看过大海的人，就难以被江河湖水所吸引了。

事实上，王勃与泰山还是颇有渊源的。史载，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封禅泰山时，王勃即献《宸游东岳颂》。总章元年(668年)，王勃作《九成宫颂》再次讴歌封岱之典，中有“川分帝子，控鯨鳌而疏源；岳动天孙，拥熊山而列镇”之句。因此，王勃很可能曾随侍封禅泰山，所以才会有“登泰山而览群岳”的真切感受。(杨立新)

经典品读

《公羊传》的诠释模式

《公羊传》是诠释《春秋》的一部著作，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经典注疏之作中显现了独特的诠释特色。它的解经模式不仅带领公羊学家在思想创新上不断前进，也影响了历代为关注现实需求而重新诠释经典的思想家们。《公羊传》对《春秋》的诠释无疑是极为成功的，这使它从儒家经典中第一个脱颖而出，对西汉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公羊传》与同是诠释《春秋》的《左传》结出了完全不同的成果。《左传》努力丰富《春秋》记述极为简略的史事，带给人们一部文字生动、叙事翔实的史学作品。而《公羊传》大力阐发《春秋》简约文字下所蕴含的义理，带给人们一部讲述礼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哲学作品。同一部典籍，诠释者的诠释目的不同，对典籍性质的认识就不同，其切入的角度也必不相同，其诠释出来的成果也就会存在根本差异。

《公羊传》对《春秋》文本性质的转换之所以可能实现，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春秋》之中存在

着“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就是隐晦的文字，即指《春秋》文字的实际意义无法从文字表面获得；“大义”，就是指《春秋》表面文字下所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和理念。如果《春秋》没有大义，其文本属性将往何处转？如果不是通过微言来寄寓大义，《春秋》的文本性质也就根本没有理由被转换。

《公羊传》的解经模式赋予经典诠释以开阔的空间，使经典的诠释不会因拘泥于经文而窒息。《公羊传》主张突破文字的限制，甚至有的时候似乎已经失去了对经典应有的尊重，实际上，这正是经典持续生命力之所在。经典能超越时间的限制，可以不断地因应新时代的挑 战，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诠释者的这种创造性的诠释。也正是借助于此，公羊学的理论既可以在汉武帝时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现，又可以在晚清容纳西方思想，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面貌和政治进程。

(据人民网)

国学教育

掌握这几点，现代人也能写好古体诗

诗性的有无，也决定着古典诗歌创作的未来。修复诗性，也应致力于对包括“兴趣”“格调”“神韵”“意境”甚至“诗法”等古代诗学范畴的精准阐释与充分拾取

诗歌是表达情感，寄托人生情怀最精妙、最灵动的文体。古典诗歌曾经辉煌于诗国的历史，但现在却失落了曾经至高无上的文体权力。探讨古典诗歌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处境与未来走势，为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这种古典艺术形式找到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 路径，是每一个诗国后人应有的文化责任与历史担当。

作诗当“以意为主”，以“活法”运之

现代律诗的创作与批评，存在着“以律绳诗”的单维批评定式。专求格律，忽略诗歌所要传达的情志内涵，并不十分在意诗歌的意境、韵致或是格调。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曾对当时类似的风气进行分析，认为“泥古诗之成声”和在平仄字句方面“摹仿而不敢失”的做法，会导致“无以发人之性情”的结果。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根据新的时代特性和实践期许及时进行创变。我们今天的律诗创作，却是一种以格律为宗旨和评判法则的单维批评模式，甚至是唯一的评价矩 度，或者可以叫作一种公式化的思维定式和批评行为。这种批评思维和批评逻辑实际上比概念化批评更缺乏艺术精神。

范梈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以意为主”便是诗歌创作的

核心要领。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指出，“学诗当识活法”，而“活法”，是“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诗人“以意为主”，创作时再以“活法”运之，便可造就鸢飞鱼跃般活泼生动的诗歌境界。

作诗当“以意为主”，当以“活法”运之，古人看得何其透彻！“意”可包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精神活动。“活法”则是诗人贯通自身与前人矩矱并“神而明之”的诗学真髓。只有写出真景、真情，才有真诗。也只有不拘束于形式格律，不计较于尺寸得失，才能“以意为主”，才能不失真挚自然之妙。作诗要真，就不能以律绳己，更不能以律绳人。盘活古代诗歌艺术传统，将其发扬光大，不能“参死句”，守“死法”。唯有开放和包容，古典诗歌才有未来。

诗要融入生活，不能以形式格律绳束创作

“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皎然《诗式》)在古代文学的文体序列中，诗最具文体权力。而诗歌这种文体权力的获取，与古代诗歌具有非常强大的文体功能有关。古代诗歌文体功能之强大，几乎可以说，举凡人生际遇、世事感慨、家国命运以及山川草树、荆野风华，均可以诗来表达。诗人周围世界的丰富多样和变动不居，决定了诗世界同样地鱼海涵，无所不有。正因为具备了强大的文体功能，故而在古代各种文体共同构成的文体秩序中，诗歌处于金字塔顶尖，也最具文体

权力。

古典文学发展到新文学，文体序列重新排布，新的文体秩序和文学格局未及容留古典诗歌进行后续展示的机会，古典诗歌遂在新文学视野中失位、失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文化消费的快餐化又使得古代文学的诗性传统被现实生活冲刷，被时代总体的叙事风尚湮灭。诗性已然弥散到其他文体之中去发挥边缘作用，无法再通过整肃的独立文体去聚拢力量并发挥作用。

以形式格律绳束创作并主宰批评，是虚空诗歌文体功能的最大因由。诗写得是否符合形式规则，是不是像古人，成为作者是否“入流”的唯一标准。明代袁宏道在其《雪涛阁集序》中对当时诗坛“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的现象极为不满，认为这样导致了“有才者拙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的局面。这种无视实际、闭门造车、自我束缚地一味仿效模拟，便成了古诗创作的痼疾——诗无法去融入生活，无法发挥哪怕是些微的文体功能，其文体权力的丧失，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古诗创作是诗心的体现，是诗情涌动的结果

诗性的有无，也决定着古典诗歌创作的 未来。诗性是深情的寄托，真心的流露，是“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综合意蕴。诗化境界源自诗性的寄寓，它是

一种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境界。只有找回我们失落了的诗性情怀，才能使得古典诗歌，那种曾经触动我们先辈的声调、韵律不在当下浮躁的文学语境中继续失声，才能使我们的 心灵世界不被逼迫的时代节奏冲击成碎片，从而诗意地活在当下，诗意地应对周遭变动不居的一切。

修复诗性就应该拾取古代诗学传统的基本意旨，这就要求我们从内心去培植诗性情怀，以此作为我们唤醒诗心的精神场域。修复诗性，也应致力于对包括“兴趣”“格调”“神韵”“意境”甚至是“诗法”等古代诗学范畴的精准阐释与充分拾取，这样才能在新的文学语境之下对我们固有的诗性传统予以激活。古诗的创作应是诗心的体现，是诗情涌动的结果。在创作时，要合理地根据情感抒写的需要安排意象，从而构成意境。创作时还要灵活变通地对古人的“诗法”予以运用。

从修复诗性内心起步，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对待一切绵延诗国气脉的创作，以坚实稳健的诗学素养支撑诗国堂庑，唤醒诗化精神，才是我们能够持续垦殖于诗国沃土的心灵期许。

修复时代的诗性内心，增强创作者与批评者的诗学素养，在此基础上因应变化、顺应时代，去重获文体权力，是古代诗歌精神的深层要求。“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文心雕龙·诸子》)只要人的精神世界存在，诗性就会长存，古典诗歌就会有能延续古代诗统并能描写现实的未来。

(据《光明日报》)

国学荐书

《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事关中华民族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精神状态，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动力与发展活力。有鉴于此，近年来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聚焦文化自信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维度和角度对文化自信进行了阐发和诠释。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先达，近年来就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内在关系、运行逻辑和生成机制等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和见解，其所著《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书，力求厘清民族复兴的文化逻辑。(陈先达 著)